

徐志摩后期没有流入“怀疑的颓废”

王晓林

(南京经济学院 基础部,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后期的徐志摩与前期一样,在言行上仍然追求真爱、民主、科学的理想。同情贫苦,批判现实黑暗,热爱大自然,努力寻求正确处理现实与理想矛盾的方法,来化解心中的苦闷,从而使自己在窘迫的境况中,坚持严肃且原则地做人。

关键词:徐志摩;后期;思想意识;探讨

中图分类号: I206/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1)03-0056-07

Xu Zhimo Hadn't Moved to "Suspicious Decadency" at His Later Stage

WANG Xiao-lin

(Basic Department of Nanjing Economic College,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As at his preceding stage, Xu Zhimo had also pursued the lovely, democratic and scientific ideals at his later stage. He sympathized poverty, criticized realistic dark and loved nature. He had made an effort to seek the correct methods which could treat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reality and the ideals, so as to dispel his depression and insist his serious behaving under the embarrassing condition.

Key words: Xu Zhimo; later stage; idea; exploration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争议的诗人徐志摩,无论人们对他的人生理想、政治倾向等有着怎样的认识分歧,但有一点却很一致:“如果把徐志摩本人前期《志摩的诗》与后期的《猛虎集》《云游集》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他从单纯的信仰‘流入怀疑的颓废’”。^[1]

尽管毛泽东 1926 年在记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 1935 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时,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动摇性有过分析,但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2]恩格斯说:“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3]据此,笔者对徐志摩前后期的诗歌与行为进行比较,并结合对《猛虎集·序文》的理解,再探讨他的思想意识。

—

《志摩的诗》删后共 41 首,主要是 1923—1925 年三年间所作。就其内容而言,表现他对理想(通过自己献身的文学事业在中国为实现真爱、民主、科学尽一份力)^[4]不懈追求的

约有《雪花的快乐》、《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去吧》、《一星弱火》、《为要寻一个明星》、《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无题》、《夜半松风》、《月下雷锋影片》、《沪杭车中》、《乡村里的音籁》、《朝雾里的小草花》、《谁知道》、《恋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婴儿》等。同情贫苦批判现实的诗歌约有《先生!先生!》、《盖上几张油纸》、《一条金色的光痕》、《古怪的世界》、《太平景象》、《卡尔佛里》、《灰色的人生》、《破庙》、《毒药》、《白旗》等。赞美自然、伦常、友谊、谐和、超脱的诗歌约有《我有一个恋爱》、《她是睡着了》、《五老峰》、《天国的消息》、《残诗》(社会进步、时代变迁,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沙扬娜拉一首》、《难得》、《石虎胡同七号》、《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等。抒发个人失落情绪的诗歌约有《落叶小唱》、《为谁》、《问谁》、《不再是我的乖乖》、《消息》、《在那山道旁》等。

《猛虎集》、《云游集》共收诗 51 首,主要是 1927—1931 年五年间所作。其中表现他追求理想的诗歌约有《献词》、《我等候你》、《春的投生》、《拜献》、《渺小》、《猛虎》(译)、《车上》、《再别康桥》、《干着急》、《怨得》、《杜鹃》、《秋月》、《歌》(译)、《谏词》(译)、《生活》、《残破》(该诗的主题表现作者在缺乏基本条件的环境中宁可固执己见,追求我爱,也不做自我意识

• 收稿日期:2001-04-14

作者简介:王晓林(1953—),女,四川成都人,南京经济学院基础部讲师,主要从事作家作品研究。

的反叛,显见作者的人格、品位、志气),《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哈代》、《哈代八十六岁生日自述》(译)、《火车擒住轨》、《你去》、《雁儿们》(渴求理解、温暖、爱)、《别拧我、疼》、《一九三〇年春》、《爱的灵感》等。同情贫苦批判现实的诗歌约有《他眼里有你》、《在不知名的道旁》、《俘虏颂》、《一块晦色的路碑》、《阔的海》、《秋虫》、《西窗》、《季候》、《黄鹂》、《两个月亮》、《给一》、《枉然》、《残春》、《活该》、《对月》(译)、《一个星期》(译)、《死尸》(译)、《奥文满至狄斯的诗》等。赞美自然的诗歌约有《泰山》、《车跳》、《鲤跳》、《山中》等。抒发失望情绪的诗歌约有《深夜》、《卑微》、《在病中》、《领罪》、《难忘》等。

后期不懈追求理想的诗歌,较为突出的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再别康桥》、《生活》、《渺渺》等。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发表于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在这首诗中,作者批判了现行社会为追逐时髦而放弃真理、放弃自我意识的普遍现象,同时表现了渴求理解的心态。因为与之同载的《新月的态度》诠释了主题:“成见不是我们的,我们先不问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1929年5月发表的《轮盘·自序》又说:“我敢说我是确实是有愿心想把文章当文章写的一个人。至于怎样写才能合时宜,才能博得读者的欢心的一类念头,我从不曾想到过。这也许是我的限度一宗。在这一点上,我期望我自己能望远倔强:‘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因此,对这首诗,不能简单孤立地理解为“字里行间流露出幻灭的空虚感,迷茫的感伤情绪”^[1],而只能理解为在《新月》创刊号,作为主编的作者向社会宣告《新月的态度》,同时还写了这首渴求大家理解支持的诗。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在自己同时发表的两篇文章里对一个问题持两种态度,让读者无所适从,而且,一个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对同一问题同时存在是与否两种极端表现。此外,作为作家作品的研究者,特别应该看到保持独立意识,敢于同强大的落后势力抗衡而绝不妥协,这对维持了几千年“三纲五常”封建意识的中国,其革命意义尤为显见。

《再别康桥》写于1928年底旅欧归国途中,这是一首借题表现作者不懈追求理想、人格和民族尊严的诗歌。诗的前三段用写实的手法表现诗人对曾给了他“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4]的康桥的真实的爱和细腻的惜别情怀。第四段作者以写实的笔触来到了康河上游的拜伦潭。拜伦——这位为争自由而终身不屈的斗士,是作者倾慕的对象。他倾慕拜伦勇敢追求理想的反叛精神,并以此作为自己追求理想的动力,这犹如为作者架起了通往理想的彩虹桥。因为作者1929年发表的《拜献》明确地说:“天外的云彩为你们织造快乐,起一座虹桥,指点着永恒的逍遥。”1930年创作的《爱的灵感》又称“将我的秘密”“化成指点希望的长虹”,可见,彩虹是作者心目中通往理想的桥梁,所以,作者说那“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池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有两层意思:其一,拜伦虽逝但精神不死,将永远激励自己去追求,其二,1927年4月12日政变之后,作者曾作《残春》,称“窗外的风雨

报告残春的命运,丧钟似的音响在黑夜里叮叮:‘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鲜花也变了样:艳丽的尸体,谁给收殓?’”1928年《致安德鲁》:“去年春天,内战白热化,毫无原则的毁灭性行动弄到整个社会结构都动摇了。少数有勇气敢抗议的人简直是在荆棘丛中过生活,摸到脖子,就不禁因脑袋尚存而感觉希奇了!”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后,5月5日徐志摩日记写道:“这几天我生平第一次为国事难受……日本人……欺人太甚,有血性的谁能忍耐?但反过来说,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没有一件我们受人家侮辱的事不可以追寻到我们自己的昏庸”。可见徐志摩对蒋介石对内专制独裁、对外妥协投降有深刻的认识和强烈的抵制情绪,并认为这些事件使他期冀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文学事业为在中国实现爱、民主、科学尽一份力的理想,遭到沉重打击,致其如彩虹似的梦沉淀到了水底。但沉淀不等于消失,所以他又固执地“撑一支长蒿为寻梦‘向青草更青处漫溯’。青草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漫溯’则‘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加之有星辉,使他即使处于黑暗中也满怀信心。求证:‘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顺着我的指头看,那天边一小星的蓝——那是一座岛,岛上有青草、鲜花,美丽的走兽与飞鸟;快上这轻快的小艇,去到那理想的天庭”,可见“青草更青处”在其诗中是理想的代名词,而“星辉”在《变与不变》中,照着“树尖”(心)没有变,在《我有一个恋爱》中则因其不昧而献爱,在《爱的灵感》中“在天上星,我心中亦有光明?”故他“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有星辉为他照路和作证,何惧征程坎坷。整段诗充满热情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最末一段则体现了作者的人格尊严与民族意识。早在1924年,他说:“英国人不是不会杀人,实际上他杀的比谁都多,分别就他的杀法不同,他有本领杀人不让见血;他是天才的刽子手”[《这回连面子都不顾了》(全集卷4)]。1926年又说英帝国主义“侵略、压迫,该咒。”[《吸烟与文化》(全集卷3)]这次旅欧途中,6月17日信致陆小曼:“这是英国船,客人都是些老头儿,文伯管他们叫做 retired burglars(退休窃贼),因为他们全是在东方赚饱了钱回家去的。”10月4日再写:“同船一班英国鬼子都是粗俗到万分……真是怪,一出国的英国鬼子都是这样的俗气可鄙”。说明徐志摩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本质早有认识,对英国人的很多做法也相当鄙视,因此,尽管他很爱康桥,认为“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吸烟与文化》(全集卷3)]但从未有过要在国外定居的念头,并始终坚定出国时的信念:“夫读书至于感怀国难,决然远迈,方其浮海而东也,岂不慨然以天下为已任。……其竞学而归,又未尝不思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全集卷4)]说明他对事对人一分为二,对祖国满腔赤诚,所以,他说“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是针对英帝国主义的掠夺有感而发。

1929年发表的《生活》是作者冷眼审视社会现状严肃决

定自我前程的佳品,在“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的境况中,旨在突出勇敢求索者“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手摸索着冷壁的粘潮”的形象。因为生活是人的环境和行为的总和,而强调环境的目的在于烘托形象,只有人,才是生活的主体。《生活》的主人公在前途没有希望的境况下可选或是去死或是退出,但他的选择是即便是死也只有向前。所以,写作目的是表彰主人公的勇敢精神而绝非“惊叫”生活的可怕^[1]。

《渺小》发表于1931年初,“九一八”事变之前,首句“我仰望群山的苍老,他们不说一句话”指中国历经的苦难及现行的局势使即便阅尽人世沧桑的群山也为之苍老,不能说一句话。这是作者对当时国情的清醒认识,因为作者1928年5月5日的日记评价内战已说得很清楚:“明明这是自杀的路子,明明这是开出无穷扰乱的路子,那些国民党领袖先生却还不遗余力的开辟。”1929年3月5日又信致恩厚之云:“天平的一头是那些毫无心肝的统治者,另一头是那些默默受苦的民众。这种情形一定导致即将来临的滔天灾难。”“阳光描出我的渺小”是说我个人虽然明瞭这一切,但毕竟力量太渺小。“小草在我的脚下”是说个人力量虽然微不足道,但中华民族是我的坚强后盾,因此,我可以于无声处听惊雷,坚信国势定会峰回路转,云开日出(“我一人停步在路隅,倾听空谷的松籁;青天里有白云盘踞,转眼间忽又不在。”)。

《志摩的诗》在追求理想一类中,他最喜爱的是《无题》。这首诗将自己比作朝山人,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但坚信只要有“灵魂的勇”必有“跋涉的酬劳”。《为要寻一个明星》表达作者为追求光明实现理想死何足惜的高尚情愫。后期的诗主体意识有所升华,他不再单纯地强调和表现自我,而是明确表示个人渺小,寄改变中国现状的希望于广大民众,团结一心,并认为自己虽比一般人看得早一点,不过是站在人民的肩上尽诗人职责做时代的先声罢了,诸如《渺小》、《杜鹃》等等均体现了这种思想意识。

诗人关心同情贫苦,后期诗作有的表明心志,如《拜献》:“给宇宙间一切无名的不幸,我拜献我胸腔间的热,管里的血,灵性里的光明。”《爱的灵感》:“我把每一个老年灾民,不问他是老人是老妇,当作生身父母一样看,每一个儿女当作自身骨肉,即使不能给他教度,至少也要吹几口同情的热气到他们的脸上,叫他们从我的手感到一个完全在爱的纯净中生活着的同类!”有的直接描写他们痛苦的情状,如《他眼里有你》、《在不知名的道旁》,并为自己的无助而难过。与前期诗作《先生!先生!》、《盖上几张油纸》等比较,愿为他们解除痛苦的心溢于言表,情感的表达也不仅限于同情,而是直接为他们呼告。

诗人批判黑暗现实的作品,后期较为突出的有《秋虫》、《西窗》、《阔的海》。《秋虫》旨在批判国民党政府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为积累官僚资本发行公债造成全国自上而下压倒一切的黄金热。据《中国通史·近代后编》^[5]记:“南京国民政府在其建立初期,由于连年用兵,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财政赤字也一年比一年增多。”“为使经济形势好转,国民政府实行

赤字财政政策,大量发行公债”。从1927—1931年“攫取了大量资本。这为官僚资本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中国共产党自四、一二政变后,“大批共产党人被屠杀,各级党组织被打散,工农运动遭受镇压,革命由轰轰烈烈转为冷落低沉,严峻的形势迫使中共反思,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根本无暇顾及或参与该类活动。且民间普通百姓谁也无能使“黄金才是人们的新宠,她占了白天,又霸住梦!”“人间早不是旧时候的清闲”,文化伦理道德统统靠边。这首诗的动词使用“占”“霸”等,可见其活动的主导性,因此有人指责这首诗部分诗句攻击共产主义实属理解误区,发表于1928年6月10日的《西窗》,表现了国民党统治内外交困的社会现状,到处充满贫穷、贪婪、争夺、欺骗、愚昧、混乱等等。发表于1931年的《阔的海》则着重表现当时中国的百姓缺乏起码的生活条件。此外,徐志摩后期批判现实的作品用了较多篇章揭露欺骗与被欺骗的现象,如《黄鹂》、《季候》、《深夜》、《给一》、《枉然》、《活该》等等,表明作者对当时国内风云莫测的局势深有感触,并且一再提请大家注意用自己的头脑明辨是非,指导行动。与前期诗作《灰色的人生》、《毒药》、《白旗》等相比,后期诗作内容更具体,批判更尖锐而深刻,较多作品的矛头直指上层社会及制定国策的统治者,并表现了坚决与之绝决,不再上当受骗等情绪。

诗人赞美自然的作品,前期最瞩目的是《五老峰》,作者特别称颂五老为民献身挡洪的精神,同时由此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你为什么活着?这是诗中“一个倔强的疑问”所指。后期诗作《泰山》显示了容纳一切的气度;《鲤跳》、《山中》表现人于大自然获得力量而升华。这部分作品前后期都共同体现作者对自然界的认识:人是大自然的产儿,与自然界之间存在一种领悟、共鸣、净化、升华的关系,因此,人一旦处于烦闷或病态之中,应尽快投身自然汲取新的智慧和力量。

《志摩的诗》有部分表现作者的失落情绪:《落叶小唱》追求的失落;《为谁》孤独的勇敢者的失落;《问谁》在岁月的流逝中理想的失落;《不再是我的乖乖》成熟的失落、现实的失落;《消息》动乱的失落;《在那山道旁》离别友人的失落。《猛虎集》、《云游集》中,类似的作品有:《领罪》不被理解的失落;《难忘》追求的失落;《在病中》理想的失落;《卑微》孤军奋战的失落;《残春》局势恶化的失落;《深夜》被蒙骗的失落……都是作者正视思想现实的表现。“环境的黑暗是无可讳言的。人在这种景况下,精神上没有办法不受影响。”[1929年3月5日信致恩厚之(全集卷5)]情绪只有高潮没有低潮是虚假,只有低潮没有高潮是颓丧,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才是正常和真实,何必舍真趋假,求全责备?何况这部分诗数量很少,不能代表徐志摩的后期诗作的主体精神。

徐志摩诗歌始终追求真纯的艺术感觉和真纯的艺术境界,追求内含的音节的匀称与流动,追求特定形式本体所要求的整个的完全的唯一的审美的印象抽象的形容词,追求不妨害健康的不折辱尊严的言论自由,追求永远常新的个体的最高精神之表现。而且,后期的作品围绕他追求的爱、民主、

科学的理想,随着认识的深化,对生活的剖析更加透彻,对个人的思想更加严肃,更加追求做人的原则,情感表现更加热烈激进紧迫,而无半点怠惰随便。

二

徐志摩的行动,前期基本得到肯定,因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后期因有年谱^[6-11]表述,仅摘笔者择定的实现生命的文学事业方面之要事,以阐明问题唯适。

1927年

出版散文集《巴黎的鳞爪》,诗集《翡冷翠的一夜》,翻译《英国曼殊斐儿小说集》,法国伏尔泰小说《赣第德》,英国詹姆·司蒂芬《玛丽玛丽》,发表论文2篇,诗7首,译诗3首。

开办《新月》书店,筹备《新月》月刊。

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东吴大学。

值得提及的是译作内容均为反映现实,暴露丑恶,表现穷人,揭示侵略战争本质,歌颂人文理想等等。是年1月致信胡适:“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得到一种生活的状态,可以容我用我有限的力量,在文字上做一点工作”。年底致家人信:“各人有各人的长处,我如学商,竟可以一无成就,也许真的会败家,我学了文学,至少已经得到了国内的认识,我并不是没有力量做这件事的,并且在这私欲横流的世界,我如能按定坚贞的意志,不为名利所摇惑,未始不是做父母的可以安慰的地方。”表明他对自己献身的文学事业充满信心。

1928年

出版《自剖》文集及删改后的《志摩的诗》,发表论文9篇,诗12首,译诗5首。

为振兴中国戏剧界,打破沉闷局面,以诗人身份与陆小曼合写剧本《卞昆冈》,表现穷人的苦难,得到朱自清、余上沅的高度赞扬,并且,诗人亲自参排。

作为泰戈尔农村计划在中国的代理人,继1924年筹办中国农村建设规划事宜,指望农村建设实施以后,生活丰衣足食,精神方面也是教育普及,文化获得自由地发展。

这些活动说明徐志摩为实现理想,能根据自己发现的问题,采取力所能及的方式,进行突破,生活态度积极主动。

1929年

发表论文6篇,诗作6首,译作2篇。

第一届全国美展,与杨清馨负责合编《美展汇刊》。为梁启超逝世出《新月》纪念专号。主编《新文艺丛书》创作集13本,翻译集17本。

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兼中华书局与《新月》月刊编辑。

7月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到沪,宁公演,徐志摩发起由《上海画报》492期编期刊南国戏剧特刊,并写《南国的精神》赞扬南国社戏剧运动是当时“唯有生命的一种运动。”1929年3月10日《新月》月刊2卷1号发表译文《杜威论革命》(游俄印象之一),其主题思想表现“最使我感到亲切的是一个广大的人

的革命,它所引起的一——是精力、勇敢与自信力的一度的涌起。”“它所解放出来的人的权力是不曾有过先例的”,“因此它的重要不仅是在俄国本身,而是有关于全世界的。”并在文章开头宣称“译者认为是完全不杂成见的观察。”

可见徐志摩面对现实、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在国难日见深重之时,能不带任何成见地仍然为着理想和为着祖国寻求出路。

1930年

出版小说集《轮盘》,发表诗11首,译诗3首,论文3篇,译文1篇。

与陈梦家、方玮德等筹办《诗刊》,与胡适等筹备“笔会”中国分会,筹款想重兴“新月社”。

与胡适在《新月》月刊上探索自传文学新路子。在《新月》3卷2号发表《诗刊·出版预告》,抵制“新诗没有任何前途”说。翻译发表英国劳伦斯的《自传小记》与《性与爱》(1931年2月发表),探索文学创作的源泉。

为《诗刊·创刊号》写《诗刊序语》,宣称“早晚可以放露一点小小的光。小,但一直的向上,小但不是狂暴的风所能吹熄”。又为《诗刊·创刊号》写长达4千多字的长诗《爱的灵感》,全面表现诗人对诗、对文学事业、对理想、对生活不懈的追求。翻译并发表英国禁演戏剧《墨格林尼的中饭》,表现对内独裁统治,对外侵略扩张的墨氏到处受到人民的指责。

介绍茅盾与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史沫特莱认识,督促储安平“在写作时,我们第一不准偷懒”。鼓励刘海粟“宁弃一学校而全艺术”,等他学成归国。冬为蒋慰堂出国留学筹资四处奔走。

诗人是年先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冬被国民党赶出光华,遂辞去中大职务。兼任上海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编辑,中英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

1930年的活动表明,徐志摩为新诗的发展竭尽全力,为中国的前途竭尽全力,却并不被国民党接受。

1931年

出版《猛虎集》,发表诗16首,译诗2首,论文3篇,译文3篇,写作并刊出赞扬与同情革命者的小说《珉女士》。

为上海大东书局编辑《新文学丛书》,参加新目书店准备出版的《现代文化丛书》规划。信致胡适,告知《新月》扩充股份,拟岁出书至少50种,并办《新月》及书报流通社。

去燕大、清华演讲,驳斥胡先骕对新诗的攻击,后又提出公开讨论新诗问题。

任教于北大、女师大,兼任上海中华、大东书局编辑。

为营救共产党员胡也频四处活动,并提供营救经费。沈从文为营救胡也频落职,徐志摩为其出版两本书,后又介绍他去青岛大学任教,并为他筹备送丁玲母子回湖南常德的路途费用。

这年诗人虽然遭到国民党的驱赶,徐志摩并不气馁,一如既往地做着自认为该做的事,并坚决地与家人别离北上,杀出重围。

显而易见,徐志摩后期具体事务性工作比前期增多、客观地认识一个人的精力所能承受的工作量,他尽力了,而且随着现实的发展他对事物的认识也在发展。除日常工作之外,凡是接触到的、认为应该做的,他并没有计较个人的利弊得失而都做了。他的生活态度积极、思想开放、情绪乐观,行为上进!绝无半点意志消沉、精神萎靡之嫌。

三

应该怎样理解徐志摩的《猛虎集·序文》?后期徐志摩从单纯的信仰“流入怀疑的颓废”语出此序,但题目“猛虎”语出英国18世纪诗人版画家威廉·布莱克的《猛虎》诗,作者夸赞画中的猛虎具有惊人的雄厚,夸赞胆敢擘画猛虎的巨匠是也能造小羊的既平凡又普通的人。徐志摩1931年4月翻译并发表此诗,8月写作并发表序,应见其本人用意:一方面肯定这本诗集的思想艺术成就,一方面强调自己的极其普通平常(凡属人之常情他都具备,如有勇敢的一面,也有怯懦的一面,有刚强的一面,也有柔弱的一面,有优秀的气质,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普通平常人)。吴宓说:“志摩的诗集,有一种名曰猛虎集,猛虎是指志摩”^[9],说对了一半。

在徐志摩的10年文学生涯中,他曾三次对外宣称“我不想成仙,蓬莱不是我的分,我只要地面,情愿安分的做人。”第一次见于1925年的《迎上前去》,当时他刚接手《晨报副刊》,第一天便向读者宣布“我只是个极平常的人”,“要来认真做一点‘人的事业’——开口说话提笔写字”,“我不敢保证我的话一定在行,我敢保证的只是我自己思想的忠实”。第二次见于《翡冷翠的一夜序》,源于一个朋友称他“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为文人。”他说“煞风景,当然,但同时我却感到一种解放的快乐——”第三次见于1928年加入《志摩的诗》中的《恋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足见志摩从来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凡人,而且序作者先谈写序不易,接着回忆他走向文学道路的过程,并讲到一、二本诗集的不足,最后三段谈他出版诗集的背景目的和希望,并高擎着理想,睁大着眼,抉别人生的错误,再次证实《猛虎集》名称的双重含义,也是作者匠心独运之处。

介绍《猛虎集》出版的背景,见于该序倒数第三段,一方面突出“生活的重重压迫”,一方面表现自己在此之下的精神危机,但事实胜于雄辩,《猛虎集》问世了!

说他高擎着理想,是因为他对诗歌创作的自我要求是:“我只要一天生产一首短诗,我就满意。”[25年3月18日信致陆小曼(全集卷5)]对人生他要求:“对己、对友、对社会、对天,我们有奋斗到底,做到十分的责任。”[25年9月19日《爱眉小札》(全集卷5)]对爱情他要求:“爱是人生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如何少得一个完全”[25年9月19日《爱眉小札》(全集卷5)]。对生活他要求:“艺术是不能脱离生活独立的,它的生存与发展是几于一定条件的。生活不允许的时候,艺术就没有站住的机会。”[《附论“文艺复衰”》(全集卷4)]但事实在诗歌创作方面

1927年仅7首,1929年仅6首,1928年与1930年稍多,也只12首与11首,离他已定目标差距甚大,以至罗隆基任《新月》主编时,致信徐志摩责怪他稿太少[《新编徐志摩年谱》(全集卷5)]。爱情方面的诗作如1931年3月19日《致陆小曼》:“前三年你初沾上恶习的时候,我心里不知有几百个早晚,像有蟹在横爬,不提多么难受,但因你身体太坏,竟连说都不能说。”1931年5月12日信又云:“老爷是一只牛,他的唯一用处是做工赚钱。”在生活方面,自他回国连年内战人心惶惶不得安宁,且1928年发表《新月的态度》,本来他的认识是正确的,他的态度是负责的,却遭到鲁迅、彭康、冯乃超等人的批判。1930年冬又被国民党赶出光华大学,以致1931年2月9日信致刘海粟,感叹“海内已定一尊,我济异端,茫茫何往?”加之母逝,使他有心力交瘁之感,所以对人生,他也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但他却始终用高标准要求和衡量自己,从无半点懈怠。

说他睁大着眼,抉别人生的错误,是因为早在1925年《迎上前去》一文中,他对何谓“单纯的信仰”进行诠释:“在我,单这开口说话、提笔写字的事实,就表示背后有一个基本信仰;完全的没破绽的信仰;否则我何必再做什么文章,办什么报刊?”从1925年至他逝世,他从未停止过说话和写字,不仅没有,反而还说:“这露棱角(在有棱角可露的)几乎是我们对人对己两负的一种义务。”[《集外文集·给新月》(全集卷4)]因此,他说自己现在是“一个曾经有单纯的信仰流入怀疑的颓废”,就是睁大着眼,抉别人生的错误。何况徐志摩对生活的磨难与精神的苦闷有充分认识,1924年8月信致郭子雄:“天时间与人生都少不了相替的阴晴与寒,”1925年3月18日信致陆小曼:“安乐是害人的。”1926年的《两地相思》:“谁说做人不该多吃点苦?——吃到了底才有数。”《附论文艺复衰》:“吃苦的日子往往是暗里发展的日子。”1929年《秋》:“这暂时的沉网绝不能压倒我们的理想,我们正就得感谢这深刻的沉网,因为在这里我们才感悟着一些自度的消息。”1930年《爱的灵感》:“更深的意义,更大的真朋友,你只能在我的眼里,在枯干的泪伤的眼里认取。”诗人不惧怕失败,1925年《无题》:“前冲,灵魂的勇是你成功的秘密!”《迎上前去》:“我相信真的理想主义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煨成灰,碎成断片,烂成泥,在这灰这断片这泥的底里,他再来发现他更伟大更光明的理想,我就是这样的一个。”1928年《新月的态度》:“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从它的核心里供给我们信仰,供给我们忍耐与勇敢。”1930年10月4日信致刘海粟:“我知道天下事只要锲而不舍不会不成功的。”1931年《诗刊前言》写道:“我个人的感觉是在文学上的革命正如在政治上透彻是第一义;最可惜最无聊是走了半路就顾忌到这样那样想回头,结果这场辛苦等于白费。”所以,他1924年在《落叶》的结尾高呼“Everasting yea!”1929年《秋》的结尾,仍然高呼“Everasting yea!”此外,对于颓废的危害性和情绪低落时应怎样对付,也有清醒的认识。1924年《北戴河海滨的幻想》写道:“青年的幻灭,更是悲剧中的悲剧,夜一般的沉黑,死一般的凶

恶。“1925年《话匣子(二)》：“在不能完全解除悲观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也还得向前希望。”1928年《新月的态度》：“虽则生命的努力有时不免比较的消歇，到了相当的时候，人们不能不醒起。”“尤其在人与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

所以，徐志摩的写实及所谓悲观，正是他思想的忠勇，有诗为证：“这日子你怪得他惆怅，怪得他话里有刺，他说乐观是死尸脸上抹着粉，搽着胭脂！这不是完全放开希冀，宇宙还得往下挺，但如果前途还有生机，思想先不能随便。为维护这思想的尊严，诗人他不敢怠惰，高擎着理想，睁大着眼，抉别人生的错误。”这虽然是徐志摩对哈代的赞誉之辞，但也是他一生的行为准则。

《猛虎集·序文》的倒数第二段，是诗人为了“证明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并“藉此告慰我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还有一口气”，特意说明诗人为何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出这本诗集。

《猛虎集·序文》的最末一段是表达诗人渴望理解的心情。他为什么要求“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是因为首先在现有的条件下，他已经尽力了。在与泰戈尔的接触中，他懂得了“一个国家的伟大，在于她每个成员的完善与高尚。”^[12]所以，他前期要求“每一朵实现它可能的色香”，并进一步要求“Know yourself”，这句话说着容易，却是所有个人努力与民族努力唯一的最后的目标，是“实现玫瑰花色香的神秘。”[《列宁忌日——谈革命》(全集卷3)]徐志摩后期要求每个人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即“对我们光明的过去负有创造一个伟大的将来的使命；对光明的未来又负有结束这黑暗的现在的责任。”[《新月的态度》(全集卷4)]“不为己的劳作虽不免疲乏体肤，但它能拂拭我们的灵窍，如同琉璃，便利天光无碍地通行。”[《爱的灵感》(全集卷1)]本着这个前提，他对物质生活始终追求简朴勤奋。《爱眉小札》：“朴素是真的高贵。”“我认定奢侈的生活不是高尚的生活”，“论精神我主张贵族主义；谈物质我主张平民主义。”1928年6月25日致陆小曼：“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决不是好事。”对人始终廉卑宽容。1926年《落叶序》：“近来益发感觉到活力的单薄与意识的虚浮，比如阶砌间一凹止水，暗涩涩的时刻有枯竭的恐怖。”1929年《轮盘自序》：“明知是糟踏文字，明知写下来的几乎全部都是 Still-born，还得厚脸来献丑。”1931年《猛虎集序文》：“明知这些偶尔写下的诗句，尽是些‘破破烂烂的’，万谈不到什么久长的生命”。1923年因发表《坏诗、假诗、形似诗》而引发郭沫若誉议“一个资产阶级的小丑”并宣布与之绝交。1924年徐志摩发表《征诗诗启》却云：“譬如苏曼殊的拜伦译不如郭沫若的部分表译”，1931年信致曹葆华：“情文恣肆，正类沫若”。对人生执着追求爱、民主与科学。徐志摩极爱祖国，1924年《留别日本》言道：“我不敢不祈祷古家邦的重光。”1928年《新月的态度》：“凭这点集合的力量，我们希望为这时代的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这时代的生命添厚一些光辉。”他爱人民，表现在1927年10月26日信致周作人：“愿兄暇时更多抒写

众生苦闷，亦可怜也。”1929年3月5日信致恩厚之：“现在有些省份已经沦为民生极度凋蔽的人间地狱。我亲眼看过在死亡线挣扎的北方，每一念及那边的情形，我的血液会骤然变冷。”他爱民主，1923年《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有言：“如果政治的中国能够进化到量米烧饭的平民都有一天感觉到政治与自身的关系，也会得仰起头来，象四大妈一样，问一问究竟统一党联合会是什么意思，——我想那时我们的政治家与教育家(果真要是他们的功劳)就不妨着实挺一挺眉毛了。”1926年《列宁忌日——谈革命》：“就中国论，革命总应得含有全体国民参加的意义。”1928年《新月的态度》：“思想上言论上更应得有充分的自由，不错，但得在相当的条件下，最主要的两个条件是(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则(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买卖毒药，买卖身体，是应得受干涉的，因为这类买卖直接违反健康与尊严两个原则。”他爱科学，1926年《关于苏俄仇友问题讨论的前言》写道：“‘直’是最无敌的力。”《自剖》：“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谎骗你自己……还不如及早认清自己的深浅，不要把不必要的负担放上支撑不住的肩背，压坏你自己，还难免旁人的笑话。”《再剖》：“我不曾期望同情，我只要朋友们认识我的深浅(我的浅)，我最怕朋友们的容宠容易形成一种虚拟的期望。”1929年《想象的舆论》：“一个火山在它的大进裂以前，在它喷吐纯粹的光芒烛照到天外的火焰以前，它先得决破多层的地壳，先得抛掷了多量的磊块与泥砂。我们不可因为现在单看见土而忘了蕴藏在底里随后的万丈的光焰。”1931年《诗刊前言》：“我们都还是在时代的振荡中胚胎着我们新来的意识，只有在一个波涛低落第二个还不曾继起的一俄顷，我们或许有机会在水面上探起一个半晕眩的头，在水雾昏花里勉强辨认周围的光景，这分明离‘静观自得’的境界还差得远。”“我们是要在危险中求更大更真的生活”。

徐志摩非常懂得“我这一条臂膀能有多大能耐，能举起多少分量？不靠朋友们帮忙是做不成事。”[《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全集卷4)]“世上不少明白的人，不少纯洁的心，不愁没有同情的感召，不愁没有价值的认识，迟早间——凭着这点子信心，我今天再来继续我的摇笔杆儿的生活。”[《灾后小言》(全集卷4)]因此，1924年他写了《叫化活该》，1927年写了《变与不变》、《天神似的英雄》，1930年写《卑微》，1931年写《渺小》、《雁儿们》等，这些作品告诉人们，虽然岁月流逝环境变迁，但变的是形不变的是魂，他是一块丑石，需要人们的爱护与扶持。

周恩来在1944年对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情况回忆说：“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13]可能因此造成文化界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例如徐志摩在1930年的《笔会缘起》一文里谈到：“我们看了近年国内文学界的分裂又分裂，乃至相与敌对相与寻仇的现象，觉得有些寒心”，“非得到仇恨与怨毒象剑戟似的插满了人道的营垒才能发生彼此原是同根的感觉吗？”又例如他的《新月的态度》被认为是针对革命文艺的，表现他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严重对立[《新编徐志摩年谱》(全集卷5)]，甚

至称他“是代表的布尔乔亚诗人”^[10]等,对他表现出极度的不理解,甚至是错误的批评,这大概也是他坚决要求并再次申明“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地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一片。”^[10]的缘故吧!

在思想意识方面,徐志摩始终认为人生不过沧海一粟,但即然为人,就得“认真来扮演我们的名份”[《新月的态度》(全集卷4)],因此,他从来以爱祖国爱人民为本份,以推进民主科学为己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期冀相互沟通,理解互助,共同升华,为国家为人民为真正的正义做勇士。

四

时至今日,中华民族正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大步走向民主、科学、繁荣。应该怎样正确评价徐志摩其人其诗对中国新文化诗史的贡献,笔者以为,当从以下三方面引鉴。

第一,1932年1月28日淞沪事件,日本陆战队及飞机首当其冲破坏的是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暨南大学等文化部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主要方面是文化侵略和精神侵略。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我们的文化遗产,实事求是地评价,就是文化自毁,这种自毁是旁人无法做到的。

第二,胡适1922年4月10日在天津写了一首小诗云:“开的花还不多;且把这一树嫩黄的新叶当作花看罢。”^[14]

第三,中国当代大中学生普遍能背诵《再别康桥》,而诗

人徐志摩认为“万谈不到什么久长的生命的”“破破烂烂”^[10]却是具有如此诱人的艺术魅力!如此诗作在中国现代诗史上实不多见。

参考文献:

- [1]钱量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列宁.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3]恩格斯.普鲁士的胜利[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4]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A].徐志摩全集(卷3)[C].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
- [5]自寿彝.中国通史(2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6]陈从周.徐志摩年谱[M].上海:上海书店,1981.
- [7]刘炜.徐志摩年表简编[A].徐志摩自叙[C].北京: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 [8]邵华强.徐志摩文学系年[A].徐志摩选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9]徐志摩传记资料[Z].台北:台湾天一出版社,民国四十七年初版.
- [10]顾永棣.徐志摩诗全编(按集辑编排)[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 [11]梁仁.徐志摩诗全编(编年体)[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
- [12]泰戈尔.国家的进步[A].泰戈尔作品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13]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4]胡适.胡适手稿(第十集)[M].台北: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

(上接第45页)

(四)

由于三峡的著名于世源于它的特殊景观而非农牧产品,因此长江三峡两岸的景观状况,从经济角度说,关系到重庆旅游经济的兴衰;从文化角度说,关系到我们对历史文化和遗产的态度;从生态角度说,关系到整个三峡库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一言以概之,长江三峡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全归结在它的景观,失去了景观,也就失去了长江三峡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所以,我们决不应为小利而失大利,为局部而丧整体。反之,如果坚持以景观绿化和生态绿化相结合的方式对长江三峡两岸实施植被恢复,那么我们坚信,十数年之后(甚至要不了这么长的时间),长江三峡将会有极为迷人的崭新景观展现在游人面前。不仅有高峡平湖,更有色彩斑斓的峡峰对峙;春有山花烂漫,夏有群峰争翠,秋有层林尽染,冬有暗香浮动(宋代隐士林逋有《山园小梅》:“疏

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此两句人们誉为咏梅最佳诗句,故“暗香”被人们通指梅香)。三峡将恢复它曾有的原始风貌。届时,“告别三峡游”将变为“重返三峡游”,当重返三峡成为全世界众多游人的实际行动时,重庆成为世界旅游名城的目标还愁不能实现吗?

由于重庆有了长江三峡,重庆有成为世界旅游名城的条件,问题在于重庆人是否有这个愿望,决心和切实的行动把这种基础条件优化为现实条件。

参考文献:

- [1]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 [2]陈国阶,等.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M].北京:科技出版社,1995.